◎文学聚焦

儿童文学：写出人类共通情感

李东华

我曾数次深入农家书屋调研，发现孩子们最爱读的是《鲁滨逊漂流记》和《平凡的世界》。《鲁滨逊漂流记》是英国作家笛福写于18世纪的小说，而《平凡的世界》并不是儿童文学。

这两部作品缘何能够跨越时空，打动当下孩子的心灵？原因或许是，两部作品都蕴含着不屈不挠的斗志和迎接生活磨砺的勇气，这与乡村孩子尤其是留守儿童渴望走向大千世界、憧憬未来的内心是一致的。这说明，经典作品的穿透力、前瞻性和未来性，正来自于对人类共通情感的深刻洞察。

站在新世纪文学走过20年的时间节点上回顾，中国原创儿童文学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面对那些感动孩子们的作品，我们是否还应该追问一句：这些作品能否感动世界读者、未来读者和成年读者？换句话说，能否深入表现具有普遍性的人类情感，既是检验儿童文学艺术水准的有效标准，同时也是儿童文学取得更高成就的有效路径。

图片来自网络

书写“中国式童年”，不能没有面向世界的眼界

“书写‘中国式童年’”的创作主张，为新世纪中国原创儿童文学提供了丰饶的精神资源，无数写作者在中国童年经验的宝库中勘探，获得了取之不尽的写作资源。也许没有哪个时期能够像新时代的儿童文学这样在如此辽阔的疆域里驰骋：从西部到东部，从高原、沙漠到草原、大海，从乡村到都市，不同民族不同生活环境的孩子们，他们的成长故事几乎都纳入了作家的视野，并被诉诸笔端。

时至今日，我们说“中国式”里要加入“世界性”视角，一方面是说立足中国经验的书写，要有能力去烛照人类共同面对的精神难题；另一方面，作家也要有一种建立于广博阅读基础之上的宽广眼界，对世界范围内同类主题的杰作了然于心。比如关于“死亡”这个永恒的文学母题，在成人文学中也许不需要有太多禁忌，在儿童文学写作中就必须有所写有所不写。如何取舍？难度系数比较高，但也有像《马提与祖父》《天蓝色的彼岸》等颇为畅销的外国儿童文学可资借鉴。新近面世的《童心战疫大眼睛暖心绘本系列》也在这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这套由张晓玲等年轻作家创作的作品，既勇于直面新冠肺炎给人类带来的挑战，又能以儿童的视角切入，运用灵活多变的叙事策略，达到“向光成长”的艺术效果。这套绘本输出多种外语版本，走向海外小读者，显示了中国原创儿童文学与世界儿童文学接轨的巨大潜能和可能路径。

立足“儿童本位”，不能没有“整体性”视野

儿童观的变革，让新世纪原创儿童文学创作获得了新的推动力。对“儿童本位”的推崇、对儿童主体性的肯定、对童年游戏精神的张扬，是新世纪中国原创儿童文学有别于其他时期的特点。尤其是一些发行量巨大的校园儿童小说以及广受青睐的作家童年回忆，卸掉说教重负，轻装上阵，顽皮、幽默、风趣、轻松、甜美是这些作品的特点。它们得到读者的热烈呼应，反过来又强化了这一美学追求的牢固性，吸引更多写作者追随。

要让这类创作走得更深更远，必然要对“儿童性”进行更为深入透彻的勘探和思考，这就需要具备一定的“整体性”视野。其一，在理解和把握孩子精神世界的特点、刻画儿童形象时，要避免片面。我们常说，孩子是天生的哲学家，当我们强调“儿童性”的时候，并不是去简化儿童精神世界的丰富性，仅仅将其中单纯、快乐、无忧无虑的一面展现出来，而忽略成长中遇到的困难、困惑、困境。其二，儿童不是孤立的，他们是在与家庭、社会、成人世界的密切互动中成长起来的。除了孩子间的沟通交流，儿童有没有能力感知来自社会的更为丰富的信息？答案是肯定的。孩子身上折射着斑斓的时代光影，他们也有能力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去感受生活的风雨。这一点在《淘气包埃米尔》《小淘气尼古拉》以及《城南旧事》《窗边的小豆豆》等经典作品中都可以充分感受到。

强调“整体性”视野并不是说把成人的思考方式强加于儿童，让儿童文学走向“成人化”。始终以儿童的眼睛看世界，是儿童文学作品最牢靠的立足点。强调“整体性”视野的目的，意在引发儿童文学创作者的思考：如何处理儿童文学与时代重大命题间的关系？

找到重大事件和儿童个体成长之间的契合点，是写好这类作品的关键。裘山山的《雪山上的达娃》以一只小狗的视角来写青藏高原雪山哨所士兵们的生活，增强了故事的趣味性，也拉近了孩子们与遥远军旅生活的距离。美国作家劳雷尔·布雷特兹-劳格斯蒂的《寄往月球的信》中，小女孩选择给登月宇航员柯林斯而不是万众瞩目的阿姆斯特朗写信，因为她感受到了前者的“孤独”。正是这种人类普遍的情感，把登月这个重大事件和一个小女孩的现实生活和内心世界奇妙地联系在一起。除了纪实性的正面强攻，儿童文学介入重大现实题材的角度是多样的，寻找情感共鸣就是方法之一。

根植当下现实，不能没有凝视未来的目光

当下的儿童文学创作，现实题材数量最为庞大。儿童文学写作者在现实题材创作上精耕细作，不断攀登艺术高峰的同时，也应面向未来敞开无限可能。我们既期待着像《小灵通漫游未来》这样家喻户晓的少儿科幻作品的涌现，同时也要看到，一些并非是科幻小说的外国儿童文学，也包含了相当多的科学内容，甚至可以说是成长文学与科普作品的跨界融合。这种兼容多种创作元素的写作，在本土原创儿童文学中还不多见。

对人类未来生存方式的想象，尤其是对科技、生态等对人类命运产生根本性影响的重大主题的展望，儿童文学都不应该缺席。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已经渗透到人类的日常生活，孩子们当然也不例外。科技和儿童的精神成长是一种什么关系？尤其是，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的兴起，又会对孩子们的未来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都可以成为儿童文学创作关注的对象。把科学溶入文本之中，不但是对文学的知识传统的继承，呼应了人类面对未知世界时的普遍的好奇心、求知欲，也缘于人类情感的律动，都不可能离开科技的渗透与投射。

在科技之外，人类与大自然、与野生动物的关系等，也是儿童文学创作无法回避的命题。可喜的是，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家已经在这方面开始默默思考。黑鹤的《驯鹿六季》就是把一个男孩子成长的关键时刻置放在鄂温克人生活的大兴安岭深山密林中，通过显微镜般的文字细致精确地呈现人的情感成长和大自然的关系。这些探索也许因为样本不够多，还构不成一种文学现象，却也为儿童文学如何深入地发掘人类的普遍情感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作者为鲁迅文学院副院长）

◎创作谈

现场可以获得金子

——《第一时间》创作谈

何建明

电视镜头和手机微信让人们获得“现场感”越来越便捷，好像不用动脚动身，天下大事一样可以无所不知。有些作家的写作也越来越“宅”，造成一些作品的内容离现实越来越远。

几十年的写作，让我明白一个道理：一件事，听来的和亲眼看到的不一样；走马观花地看一下，与认真感受和体味又不一样；道听途说的事，和现场所见所闻的事，有时是完全相反的；投入感情的事和无所谓的事，又有根本不同……所以对创作者来说，现场的意义，将决定你创作的成败。

拿新冠肺炎疫情来说，作为一个写作者，在家里听听、看看，和到疫情暴发现场、患者抢救现场、阻击病毒侵入的机场或港口等地，获得的感受和认识是完全不同的。疫情期间，我意外滞留上海。这个城市规范化、程序化的管理和缜密细腻的治理特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小区和社区管理，好似铜墙铁壁，滴水不漏。在写作的准备阶段，我积极自觉地以一名“现场者”的身份，去观察和体验疫情中的上海，并通过一次次深入走访社区、医院和虹桥、浦东机场以及治疗新冠患者的两个“方舱”医院等地，最终写出了一份上海战疫的文学报告——这就是《第一时间》一书中的9篇作品。

创作《第一时间》，使我对“现场”有了更多理解与认识。任何形式的“生活”，莫过于对实际生活的现场感受。现场可以让每一个人通过耳闻目睹，甚至身体的生理反应，去触摸与感受客观事件的真实面目和现象本质，能带给我们对客观事物最直接、最感性，也最能抵达本质的认识。现场的精彩和复杂性，只有到了现场后你才能感受；现场可以让你的思想和灵魂作出最直接和直观的选择与价值判断，可以校正我们以往对事物认识的片面与不足。现场是有温度的，能够激发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正义感和原则性；现场又是严酷和冷静的，能让狂热和焦躁的情绪平静下来。现场是我们发现真理和挖掘金子的最好场所，没有什么比现场的体验让我们的作品来得更生动、更接近真相。用真诚的姿态去现场，恰恰可以让我们获得对事物最直接和真切的认识与体验，为更精确地表达情感、讲好中国故事服务。

（作者为中国作协副主席）

◎编辑荐书

《我的凤凰姐妹》
吴易梦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我的凤凰姐妹》以重庆秀山梅江的古老苗寨为背景，讲述了一段儿女情长的浪漫故事，融合少数民族风俗特色，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作者立意独特，构思巧妙，将苗汉文化融入青春浪漫的情感中，在人性美好情愫的演绎中完成了精彩故事的讲述。百年苗寨在作者笔下是一处理想化的世外桃源，优美的自然环境，淳朴的民风民俗，美味的苗家饮食……被作者表现得淋漓尽致。原生态里的飞禽走兽、树木花草与人物遥相呼应，又让故事充满自然野性与情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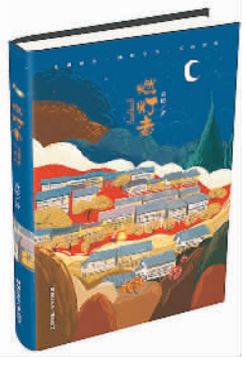
◎新作评介

时代楷模的教育初心

——读纪实文学《燃灯者》

马光复

纪实文学《燃灯者》的主人公是获得“时代楷模”荣誉称号、从杭州跨越1400公里到贵州贫困地区支教的陈立群校长。作者在开头写道：“陈校长退休后，婉拒了多家学校的高薪聘请，在同是当老师的妻子陪伴下，不远千里，来到贵州黔东南贫困地区，担任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苗族孩子、教育基础相当薄弱的台江县民族中学校长，而他开出的唯一的条件是：分文不取。”读到这里，陈立群校长的形象无不令读者为之动容。伴随着作者细腻的描绘、动情的述说，一段段感人的故事将陈立群的形象塑造得鲜活丰满起来。



陈立群是有着丰富经验的教育工作者，他深深知道，扶贫要依靠教育。他处处为学生健康成长着想，大到学校环境、学生学习和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小到一个孩子的家庭困难和苦闷心理，他都会关注并一一解决。

在“寻找马背上的女孩”一章里，作者为我们讲述了五兄妹的动人故事。苗寨里一家邰姓五兄妹，父亲去世，仅靠母亲几百元的收入维持生计。兄妹们上学住校，带走了家中的棉被。家里仅剩下一床棉被，孩子们回家，加上母亲全家六口人，一床棉被怎么盖？二姐为了省钱买棉被，竟天天不吃晚饭。陈校长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自己掏钱给她买来饭票，对她说，今后她的饭票由校长负责，要求她一定要吃晚饭。接着，陈校长又自己掏钱买来三床厚被子给她家送去。不久，当陈校长看到另一个仅有17岁的女学生辍学嫁人，不禁陷入了沉思。他意识到，教育不单纯是知识教育，更重要的是品德教育、立志教育。“扶贫先扶志。”不仅扶学生的“志”，还要扶家长的“志”。

《燃灯者》一书不仅生动描绘了主人公陈立群，同时也描绘了支教地区中学生的生活、青春期的心理变化以及他们在成长中遇到的困惑和问题。书中通过主要学生人物，如吉玛、邰家二姐、少女藕、陈水珠、高坚强、陈玲玲、董永军、朱华彬和张巧月等，抒写了中学生之间的交往、心理以及青少年性格的发展变化，勾画了具有青春期少男少女特质的一个个闪光的艺术形象。

《燃灯者》是一部励志的文学作品，内容感人，时代感强，叙事翔实、流畅、一气呵成，在表述陈校长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上，入木三分。作者是用真情实感来创作，这种感情，流淌在字里行间，像一首打动人心的诗。

◎解码文学空间

用新体验回应当下乡村

李　浩

郭红松绘

小说中的现实是我们想象的、理解的和变形的“幻想领域”；小说中的现实又是记忆的，甚至往往是远一点儿的记忆。对于乡村的书写也是如此，譬如鲁迅笔下的故乡，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史铁生笔下的陕北……

没错儿，对于小说家而言，他所写下的乡村生活可能会有“滞后”，是他童年时的样子甚至是他经历了内心改造之后的童年时的样子，从这点上来说，写作大约是面向过去的。但是，小说也是面向今天的，它不会满足于只留下记忆的印影——它要对我们今天的日常提出见解和警告。小说还应当是面向“未来”的，在未来的阅读者那里，你所写下的“旧事”依然具有启示性，依然能够引发读者的思考和情感的投入。

因此，在面向今天的这一向度里，小说家应当具备对现实敏锐的洞察，能够对人们习焉不察的日常提出独特见解；在面对未来的向度里，它需要在认知的基础上提供前瞻性思辨，要有能力让它的某些议题变得深邃且不过时……在乡土文学写作中，我们时常会注意到它的记忆承载，而或多或少忽略它的现实面向和未来面向。

近20年来，农村发展变化巨大，然而令人小有遗憾的是，这并没有很好地反映到当下创作中。我们的乡土书写多来自十数年或者更早就离开乡村的作家们的书写，这当然可贵，然而它们在“现实”和“未来”的面向中总有匮乏，对我们更深入、真切和有代入感地进入当下的现实乡村力有不逮。很多乡村新变，是旧经验所无力涵盖和解释的，而它们正是文学所需要表现的。

以我的个人经历为例。2015年左右，我到邯郸某县检察院“体验生活”。随着采访深入，我的工作重心开始偏移到对乡村的重新发现上。令我感到吃惊的是，作为一个来自农村、在县城也有十多年工作经历的作家（父母还在乡村生活，我每年都会多次回乡探望），我原以为自己了解熟悉的乡村，突然变得十分陌生，其中的诸多变化超过了我的想象。一是打工和打工人口给乡村带来的变化，有物质的也有道德的和精神的；二是土地流转给农村生产生活带来的变化，同样是那样深刻；三是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问题；四是农村男女人口比例的问题，农村中以往的“男尊女卑”的观念竟然因为乡村男女比例的变化而悄然瓦解，当然又有新问题产生……几个月的体验生活让我百感交集，不得不一次次调整自己对乡村的旧有理解。这些悄然而又深刻的变化多么需要文学的反映！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当下的乡土文学创作依然占有极大比重，但真正能够回应现状的作品似乎又极少极少。我们的文学尤其是乡土文学，似乎还沉浸在一个被反复言说、没有流速的旧时光里。

为什么？一是过去的乡村生活相对固定，而我们又有那么多以往作家的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写滞后的乡村记忆更容易，更出彩；二是所有的当下经历都是复杂的、未经梳理甚至未经验证过的，它没有更多的思想资源可以依凭，面对新现象做出判断并洞见深刻，对于任何作家来说都很难；三是情感情境的疏离，对当下乡村的敏锐感受来自于神经末梢，那种切肤感的温和凉，是离开乡村的作家难以感觉到的。四是小说写作“面向未来”的这根弦在我们的头脑里绷得还是不够紧，对现实缺乏深入思考，对“何以至此”和“它所包含的永恒性在哪”的问题未能做出回应。

不过，文学应该是而且一直是迎难而上的，希望有更多有经验的和来自于时下乡村的青年写作者们共同来承担起这份挑战。

（作者为河北师范大学教授）